

加快现代化建设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张 平 陈昌兵

内容提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我国全面建设小康后的两步走目标。为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相应地可分两步走:第一步重点要创新发展,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主创新型国家;第二步是在创新发展的基础上,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彰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优势。我国通过“赶超”增长模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为了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必须由“赶超”增长模式转型到技术创新增长模式。技术创新增长模式的构建需要增长阶段的跨越、经济结构现代化、深度城市化与创新转型,需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相应地需要政策激励的转型。

关键词:创新转型 经济结构现代化 深度城市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了我国全面建成小康后两步走的战略目标、阶段性特征和发展的路径:“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国 1981 年人均 GDP 为 286 美元,2015 年达到 8157 美元,预计 2017 年接近 9000 美元,2020 年全面实现小康,2021 年人均 GDP 突破 1 万美元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到 2035 年初步实现现代化,人均 GDP 将达到 2 万美元,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按现在的高收入组标准计算,人均 GDP 超过 13000 美元,将突破中等收入上限,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预计我国在 2027 年前后突破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到 2035 年人均 GDP 达到 20000 美元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现代化强国^①。

我们对 2021 年到 2035 年、2035 年到 2049 年的发展蓝图做一个更为具体化的路线图,明确我们到底要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以及怎样实现那样的现代化。在这一背景之下,应当如何把握我国发展第二个百年的两步走计划、路径和奋斗目标?

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的内在经济逻辑在于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工业化、国际化、城市化的三重发展,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工业化、城市化及国际化带来的“规模效率”,技术依赖于“干中学”,资本来自于积累和吸引 FDI,劳动力优势来自于“人口红利”,但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让我们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资源配置得到优化,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第二个百年目标是在积极解决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现代化。新时代的基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矛盾是发展的动力,通过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依靠创新实现经济高质量的增长。在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统领下,积极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广义人力资本服务体系,提高知识密集度和创新强度,推动经济各部门现代化建设从而实现国家现代化,这就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张平、陈昌兵,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36,电子邮箱:zhangping_cass@126.com,ccb_ccbp@163.com。

之后的发展目标 and 方向。

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可以分为两步走:第一步重点要创新发展。创新不是仅指技术上的创新突破,而是指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转向依靠创新发展,在这一发展层面上需要经济体制、经济结构、企业制度和人等方面的转型,只有奠定了创新发展基础,才能完成我国经济初步实现现代化,实现跨越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否则根基不稳难以实现百年目标;第二步是在创新发展的基础上,突出人民为中心的“共享”,彰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优势。不论是第一步还是第二步,新发展理念中的协调、绿色、开放一个也不能少,否则难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一、中国增长的 S 型路径和拐点

图 1 给出了两种经济增长方式下模拟的人均 GDP 的 S 型增长曲线,其中 1978—2016 年基本反映了我国以要素投入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新时代我国实现现代化有两个重要的选择:一是按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要素累积方式发展,随着规模收益递减,要素供给下降和资源环境束缚,必然陷入模式一的发展轨道,停滞和波动不可避免;二是以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突破要素累积的桎梏,实现平衡、协调、可持续的创新推动增长的内生增长模式,经济保持稳定增长,走向模式二发展轨道。

模式一的转折点预计在 2026—2029 年间,此时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 70%,我国的建设周期 (building cycle)即将结束,结构再配置效率下降,我们称之为外生转折点。经济增长在外生转折点到来之前必须转向创新驱动,新时代创新升级驱动的经济转型关键期就在这近十年间,否则容易陷入外生转折点中。在创新推动经济转型成功后,我国经济增长沿着模式二的路径,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经济增长到 2034—2035 年初步实现现代化;我国经济进入到内生转折点后,经济实现均衡发展,经济从要素积累的赶超阶段成功转型为创新驱动的均衡增长阶段。

1. “赶超”增长模式与第一个百年目标。“赶超”的增长模式是以“要素—规模”推动的下凹型 S 型增长曲线,也就是 S 型曲线的第一部分,以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方式。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的内在经济逻辑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重发展,经济发展主要在于通用技术部门的发展,这与以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方式相一致。通用技术部门由于技术和市场较为成熟,差异性小,生产经营风险较小,且通用技术部门在国内外均处于卖方市场,加上生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技术进步主要通过引进和模仿。因此,我国政府发挥了生产要素动员配置能力,这保持了我国经济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 (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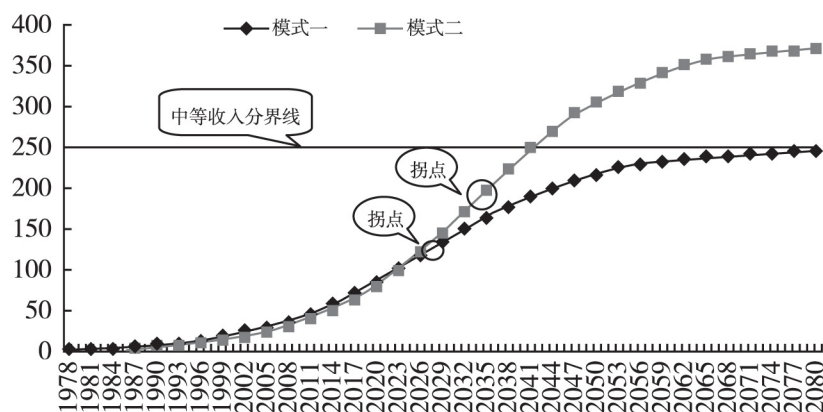


图 1 两种经济增长方式下人均 GDP 的 S 型增长曲线

注:模式一为 1978—2050 年我国仍然以要素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模式二为 1986—2050 年我国以技术创新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具体的估计模拟方法限于篇幅,未能展示,有需要者可与作者联系)。纵坐标是以 1952 年为基期并赋值为 1 的相对值。

从增长曲线来看,我国人均 GDP 产出轨迹符合递增的赶超曲线,增长模式仍属传统工业化道路。林毅夫(2012)的“赶超战略”,张军(2007)的“过度工业化”命题以及“分权与增长”的中国故事,刘世锦(2005)的“低价竞争模式”,袁志刚等(2006)对中国经济的制度、结构和福祉三个角度的考察,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8,2009)的 S 型增长曲线及“低价工业化”“高价城市化”的结构转变,Song et al(2011)概括的“中国式增长”,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我国增长模式的特点和转变方向。

在经济体制上,我国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政府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动员资源的作用,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竞争,这些有利于我国资源的调动和配置,使资源由农业转向工业部门、农村流向城市,产生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城市化聚集双重加速效应,使我国经济保持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有关我国增长模式中的政府行为,一类观点认为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集中力量好办大事,并将其归纳为体制优势和“中国模式”。但另一类观点认为政府“自由牟利”与民间的经济自由并不相容,不应是中国模式流行的原因。贺大兴、姚洋(2011)把“中性政府”作为“中国模式”主要特征之一,认为这是我国经济增长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我国赶超的经济增长模式及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的内在经济机制包括:

一是非均衡的经济增长战略。后发国家经济赶超的利器是通过政府动员资源并配置到高增长的现代化部门实现经济增长的加速,典型的是运用政府动员体制有效地将农业资源转移到工业部门。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典型的高资源投入驱动的工业化,大干快上成为常态,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工业现代化水平并不高。

二是生产要素快速积累。这种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方式具有低成本、高投入特征。在我国经济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过程中,要素市场化滞后于商品市场化,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土地、水、电等资源 and 资本、劳动力要素的价格具有政府干预因素,政府为激励企业加速完成原始积累,控制生产要素投入价格,使土地、劳动力、投资品保持较低的投入成本(如能源、水等长期低于国际均衡价格,环境、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社保等成本约束低,或者根本就没有);国家垄断金融资源,尽力动员低价供给,优先提供融资等。

三是积极参与全球贸易分工体系,技术进步以“干中学”机制为主导。通过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到全球贸易分工体系中,鼓励国际生产性资本的进口和商品的出口,最大限度地把国内低价的“无限劳动供给”和国际资本、广阔的海外市场结合起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资金、资源和市场三大问题。市场化改革和国际化推进同步进行,在开放条件下由于“干中学”效应和竞争性创新机制的获得,诱导和激活国内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形成,保证了技术的引进吸收和自我创新。

2. 创新增长模式与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内在经济逻辑在于,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靠规模发展的通用技术生产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如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型的技术进步边际收益递减以及消费需求发生变化等。为了全面实现现代化,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我国必须大力发展知识技术部门,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通过知识密集提高服务业的现代化发展水平,在技术创新和知识密集的基础上全面实现现代化(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5)。为了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后小康目标,应当积极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广义人力资本服务体系,满足人们对生活美好的不断追求,解决好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

Gill & Kharas(2007)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产生是由于中等收入国家未能完成一些重要转型,包括生产与就业多样化程度的先增后减、投资重要性的下降与创新重要性的提升等。对于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过度服务化及由此导致的低生产率和低增长陷阱问题,Cimoli et al(2006)、Rada(2007)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释。对于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发达国家普遍发生的经济减速问题,一些研究(如 Eichengreen et al,2011)通过统计分析对减速拐点进行了确认。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中,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需要重新定位。由于技术创新具有差异性和不确定性,政府进行大规模的资源动员不利于技术创新,甚至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同时,技术创新需要微观企业的行为方式也做出调整,由经营型企业转向技术创新型企业。政府在市场的技术创

新中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也会对政府经济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5)认为,构建新的创新机制需要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弱化干预、强化协调。为了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为知识过程和知识部门成长创造环境,需要弱化政府干预,强化政府在知识网络建设、疏通和新要素培育方面的功能。

二、增长阶段的跨越与经济结构现代化

1978年我国人均收入^②仅为200美元。依据世界银行2015年给出的增长阶段划分标准^③,1978年我国属于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1045美元),而2016年我国人均收入已达到8260美元,达到了中等偏高收入阶段(4125美元<人均收入<12735美元)。以现在的经济增长推算,预计2025—2027年我国人均GDP就能成功突破13000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将会成功实现阶段性跨越。按现有人民币与美元的兑换水平预计,2035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20000美元,年均增长率在4%~6%间,我国经济结构将实现现代化,但经济增长须依赖于创新。从国际对比来看,我国经济增长的阶段跨越是非常迅速的(表1)。作为大国跨越中等偏低收入阶段,我国只用了8年,与日本、新加坡、韩国相仿,未来跨越势头仍然强劲。按一般趋势计算,2026年我国将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达到高收入阶段,这预计需要17年,与美国、韩国、智利等相当,但也有很多国家没有跨越,而且跨越后并不稳定。总的来说,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本质上不是名义上的跨越,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都曾跨越,但随后经济停顿和币值大幅度贬值,马上又回到中等收入阶段。

表1 中国与世界各个国家中等收入阶段增长情况

	人均收入处于中等偏低收入阶段的年份	处于中等偏低收入阶段的年数	人均收入处于中等偏高收入阶段的年份	处于中等偏高收入阶段的年数
中国	2002—2010	8年	2010—2026	17年(预计)
美国			1966—1980	15年
德国			1973—1980	8年
法国	1962—1973	11年	1973—1980	8年
日本	1967—1974	7年	1974—1986	13年
新加坡	1971—1980	9年	1980—1991	12年
韩国	1978—1988	10年	1988—2003	16年
巴西	1975—1996	22年	1996—2013	>18年 ^④
阿根廷	1964—1992	29年	1992—2013	>22年
智利	1971—1995	25年	1995—2012	18年
乌拉圭	1973—1993	21年	1993—2012	20年
马来西亚	1978—1996	18年	1996—	>22年 ^⑤
泰国	1988—2009	21年	2009—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楠玉博士依据WDI数据库整理。

真正的中等收入阶段跨越需要完成三个飞跃:(1)经济结构的现代化,具有很强的自我调整能力和韧性;(2)创新对经济贡献明显提高,经济增长依靠内生创新力,这样才能有效地抵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3)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激励的微观创新机制,有效平滑经济增长的波动、保持币值稳定、自我修复和宏观稳定能力等。

新时代经济转型的核心在于经济结构现代化、增长平稳、市场配置和创新驱动的内生增长模式。我国经济在赶超阶段取得了巨大成功,政府积极参与发展,要素投入积累、比较优势带来开放红利,形成了特定发展阶段的“规模—赶超”效应,经济高速增长。在高速增长的背后,也导致了区域发展的不协调、经济结构不平衡、资源环境不可持续等问题。经济增长模式效率重塑是重大战略问题,一方面可以延长赶超期,另一方面按新发展理念进行平稳转型,推进经济增长进入到创新、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中,实现经济结构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经济结构现代化的标准很多,但有三个基准:(1)要建立现代产业体系,要“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

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2)内需为主导,消费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并通过不断提高广义人力资本的消费比重,即科教文卫体的消费比重,提升人力资本,促进人的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同时,提升国家创新能力;(3)经济结构中的可持续、包容性的特征凸显,主要指各类内生创新对经济贡献的不断提高。跨期活动中,人们追求长期繁荣、协调、平衡的活动,不断替代短期中人与人的利益冲突、人与环境的冲突,提升绿色和共享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和包容增长。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成功跨越了两个阶段:一是由农业主导到工业主导;二是由工业主导再到城市经济主导。其产业结构特征是制造业的高技术与服务业的现代化共同托起中国的现代经济体系。

1. 产业结构现代化。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如下的趋势(表 2):

(1)保持工业比重,逐步提高高新技术企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我国工业比重从 2006 年达到 42% 峰值后一直下降,到 2016 年只有 33.3%。一国工业比重与其国际竞争优势高度相关,而国际竞争力来源于高新技术制造业。按 OECD 国家标准计算,在人均 GDP 为 20000 美元的阶段,制造业可保持 30% 的比重,而高新技术企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25%。我国现在高新技术企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 15%,预计 2035 年将会提高到 25%(刘世锦,2017)。我国制造业将继续保持在 30% 份额,完成制造业结构升级,为产业结构现代化奠定创新与实体经济的基础。

(2)我国服务业中知识密集型的金融业和其他服务业增长迅速,其中“其他服务”中的“科教文卫体”等是我国现在需求最旺的部门,已经占 GDP 的 20.5%,成为仅次于制造业的第二大产业,但当前仍属于分类不清的“其他服务业”。“其他服务业”包含了“科教文卫体”等有关人力资源协调发展的主要行业,但这些服务多由事业单位供给,“看病难”“上学难”等表明这类供给明显不充分,需要加大供给侧改革力度提高供给效率。我国服务业结构自我调整的空间余地大。当前金融业占 GDP 的比重达到 8.3%,已经位居全球第一,提高的余地很小,主要是提高金融配置资源的服务效率,从传统金融业转变为现代金融业。未来服务业上升的空间集中在其他服务业中的“科教文卫体”等,有助于提高广义人力资本的生活服务领域,且发展空间很大。

(3)绿色发展。低碳排放等绿色循环经济成为经济的另一大动力来源,特别是 2016 年开始的环保督察以来,绿色发展得到明显推动,更好地促进了产业组织的集中化。

我国供给结构现代化进展迅速,但逆现代化结构中低劳动生产率的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在“政策激励”下快速上升,建筑业比重从 2008 年到 2016 年上升了 0.8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房地产业比重上升了 1.9 个百分点,其上升有反周期性的特征,对缓冲就业压力有积极意义,但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产业效率的提高。

表 2 中国主要经济部门占比情况

(单位:%)

经济部门	1978	1988	1998	2008	2016
农林牧渔业	27.9	25.5	17.4	10.5	8.9
工业	44.1	38.3	40.1	41.2	33.3
建筑业	3.8	5.3	5.9	5.9	6.7
批发和零售业	6.6	9.8	8.1	8.2	9.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4.9	4.5	5.5	5.1	4.5
住宿和餐饮业	1.2	1.6	2.1	2.1	1.8
金融业	2.1	4.3	5.1	5.7	8.3
房地产业	2.2	3.1	4.0	4.6	6.5
其他	7.2	7.5	11.9	16.6	20.5

注:数据来自 Maddison(2007)和《中国统计年鉴 2017》。

经济结构现代化的最主要特征是不再追求结构比例,而是追求效率最高。产业结构变化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导,以提高创新和效率贡献为基准,其均衡性表现在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上。从国际经验看,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服务业占比逐步提高,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是一致的。偏制造业的

德国、日本,其服务业稳定在70%,而韩国则一直稳定在60%。制造业对一国持续提高生产率是重要的。在2035年以前,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关键是升级,持续提高高新技术制造业的份额。我国去工业速度过快,制造业30%的份额是我国进一步发展的根本性物质保障,但靠原有低成本竞争优势已经不可能了,必须转型升级,靠技术进步和质量优势保持份额。我国经济服务化趋势在继续加强,但服务业的根本是现代服务业,特别是与人有关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但现在这些服务部门仍保持较高的行政垄断性,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还会因管制使服务价格不断提高,导致“鲍莫尔成本病”,拖累经济增长。我国服务业的体制改革和结构优化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面,核心是加快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的科教文卫体等产业的发展,并积极推动金融现代化转型,提高全社会要素配置效率。

2. 需求结构现代化。经过改革开放40年发展,我国需求结构发生了如下变化:(1)出口贡献在我国快速发展的1995—2008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利用比较优势,我国经济增长高速发展。2009年后我国经济逐步转向内需,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基本是负的,带动了全球经济的复苏,当然全球经济对我国经济的带动意义仍然很大。(2)我国需求结构逐步均衡,2016年消费贡献达到64.6%,也纠正了改革开放之初的投资贡献高达67.8%的畸形投资,经济逐步平稳均衡。

当前城市消费实际增长偏慢,2017年1~9月,城市消费实际增长率只有4.5%,城市居民消费和投资主要被住房所占据,居民住房消费支出占消费的比重为22%,与之相对的是交通通讯费占比13%,而在居民收入中还息占收入的9%,因此住房消费整体偏高不利于消费作为城市经济的基础动力。虽然需求结构逐步均衡,但其内在动力和结构都面临不少挑战,存在进一步调整的空间。

表3 中国需求端各部分对增长的拉动

	1978	2008	2016	1978	2008	2016
	增长拉动(百分点)			贡献率(%)		
消费	4.5	4.3	4.3	38.3	44.2	64.6
投资	7.8	5.1	2.8	67.0	53.2	42.2
净出口	-0.6	0.3	-0.4	-5.3	2.6	-6.8

注:表中数据来自相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工业化带动了城市化,体现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现代化部门,工业在城市及城市周边的全面发展推动了城市开发区、工业园区迅速建立,城市化速度大幅提高,农村人口不断转换为城市人口。随着工业化增长稳定或下降,城市化率的提高完全是由经济服务化推动的非农就业比重上升所带动的。工业化带动了城市化发展,而城市化的发展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现代化,其经济结构均衡,本质上更表现为人口资源配置和城市创新功能的塑造。

三、深度城市化与创新转型

一国现代化的基本构建是城市经济。新时代发展阶段更为显著表现为城市经济的成长和发展,它决定了我国中长期的增长潜力。城市化发展阶段和城市经济创新转型是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2016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57.35%,按城市化规律曲线计算(图2),2019年我国城市化率将突破60%进入深度城市化,城市化不只靠农村向城市进行人口转移,而是取决于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快于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获得的城市化率提高,因此城市化逐步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数量扩展转向深度城市化,即人的市民化过程。2023年我国城市化率预计突破65%,进入亚洲国家城市化放缓阶段,2028年我国城市化率将会突破70%,按照国际城市化规律将进入缓慢增长阶段,城市化带动的大“建设周期”将在2023—2028年间逐步结束,依靠城市化建设带动经济增长将告一段落,经济发展靠人的聚集和创新发展的深度城市化带动。经济增长模式必须完成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我国经济要依靠城市经济带动创新发展,到2035年城市化率超过75%,2050年在城市化率达到85%,我国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城市化推动创新转型不同于工业化创新转型,其创新的特征是从单一物化发展的技术进步转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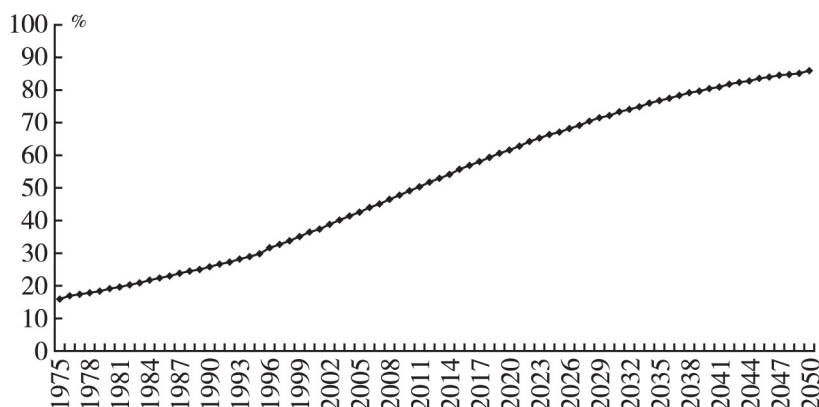


图2 到2050我国城市化率模拟预测

注:图中的城市化率的预测来自陈昌兵(2016),并根据最新数据进行了修正。

为以人为中心发展的创意、广义人力资本提高和优化资源配置为主导,并与实体经济技术进步相互推动的创新体系。新时代的转型发展目标从传统工业化时期偏于产业结构政策目标,转向“质量、效益、动力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新现代化政策目标体系。深度城市化更加强调城市中“人的发展”推动创新的城市化,而不是一般城市化中以“人的转移”为主导的城市建设扩张。从现实发展的趋势看,我国经济转型的根本在于三个方面:(1)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我国创新转型的重中之重,创新转型核心是看全要素生产率贡献能否持续提升;(2)深度城市化创新转型就是要提升人的“广义人力资本”消费比重,提高教育与健康水平,形成消费提升人力资本,再提升创新效率;(3)建立新时代配置要素效率和激励动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化资源配置和激励创新。

1. 迈向高质量、高效率的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我国经济迈入中高端发展阶段必须重视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两个效率的同步提升。只有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才能稳步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直接决定了工资水平提升速度,同时,劳动生产率增长反映了人力资本深化程度并决定了一国福利水平。在工业化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依靠的是“资本密集”来提升劳动生产率,而经济结构服务化后,劳动生产率提升依靠的是“人力资本密集”来实现劳动效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贡献不断提高,是企业技术进步与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综合反映。只有全要素增长率超过要素投入带来的增长时,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而且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视为内生增长贡献水平的测量。放大至一国来看,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提高意味着一个国家经济增长逐步摆脱要素投入带来的增长,进入到内生增长的路径,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本身就是克服人力、资本深化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减等问题。

改革开放40年的增长中,我国资本投入对GDP增长的贡献,一直维持在70%~80%的水平,综合考虑资本、劳动力对增长的贡献之后,效率改进对GDP增长的贡献大致维持在20%~30%的水平。显然,这种较低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是我国资本驱动的增长模式的特定现象:(1)资本存量增长持续加速。由表4可知,在经济持续超高速增长 的1978—2007年间,资本存量年平均增长率为11%左右,不论与发展阶段相似的哪个国家相比,这个资本积累速度都绝对是高的。2008—2018这个时期,虽然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在下降,但是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仍然维持在11%~12%的高水平。(2)资本边际收益持续递减。长期的投资依赖导致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而且报酬递减和低增长的不良循环以及我国资本驱动模式路径依赖的低效率问题越来越明显。由表4可知,1978—2007年间,资本效率(Y/K ,即GDP与当年投资之比)为0.302,而2008—2015年间,我国资本效率仅为0.079。

由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计算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我们发现:(1)1978—2007年我国高速增长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3.33%,细算1993—2007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35%(陆明涛等,2016);(2)2008—2018年增长速度下滑期间,经计算得到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降低至20%以下,这是因为,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大规模刺激资本积

累的方式来进行的。展望未来经济增长,资本规模递减特征将会越来越严重,如不改变 TFP 对经济增长的低贡献现状,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会持续下降。

表4 我国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分解

	1978—2018	1978—2007	2008—2018
[1]潜在增长(生产函数拟合)三因素	9.50	10.03	8.08
[2]资本投入(K):弹性	0.635	0.636	0.631
[3]资本贡献份额 $=([2] \times [8])/[1]$	71.69%	64.83%	87.05%
[4]劳动投入(L):弹性	0.365	0.364	0.369
[5]劳动贡献份额 $=([4] \times [11])/[1]$	8.73%	11.84%	2.23%
[6]TFP:增长率	1.86	2.34	0.866
[7]TFP 贡献份额 $=100-[3]-[5]$	19.58%	23.33%	10.72%
[8]资本投入增长率 $(k=dK/K)=[9] \times [10]$	10.99	10.96	11.04
[9](净)投资率 (I/Y)	45.44	39.31	130.76
[10]资本效率 (Y/K)	0.242	0.302	0.079
[11]劳动投入增长率 $(l=dL/L)=[12]+[13]$	2.272	3.263	0.504
[12]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 (pop_t)	2.603	3.709	0.657
[13]劳动参与率变化率 (θ_L)	-0.331	-0.446	-0.153
[14]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y=Y/L)=[15]+[16]$	3.741	3.88	3.433
[15]资本效率 (Y/K) 增长率	-5.429	-4.765	-7.12
[16]人均资本 (K/L) 增长率	9.17	8.645	10.553

注:表中数据来自《迈向中高端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载《经济增长蓝皮书(2017—2018)》,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一般而言,内生增长的测算有两个重要维度:(1)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保持在30%~40%的水平,经济进入较为稳定的发展阶段;(2)劳动产出弹性提升到0.60左右,这表明该国经济由消费主导和人力资本主导。我国资本产出弹性依然高达0.60左右,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下降到10%,这些说明我国经济增长仍然处于资本要素驱动的状态。我国经济转型任重道远,这里包括如何提升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让消费真正成为推动经济的基础性力量;注重人力资本对创新和要素优化配置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2. 消费与人力资本积累的良性互动是国家创新的核心。从城市化率与消费率之间关系的国际经验来看,消费率与城市化率呈现“倒U”曲线(图2),即城市化率超过56.19%,消费率不断提高。我国2015年城市化率超过56%后,消费率持续上升,“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加强。城市化推动消费率提高是发展的趋势,消费提升的本质上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包括一般物质的满足,还包括高品质的生活品和现代服务的需求,特别是能提升“广义人力资本”的消费,即科教文卫体领域的消费。从我国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看,当前消费主要集中在吃、穿、住、行、用上,2017年1~9月,其消费占比达到80.5%,而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健康占比仅为19.5%。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健康占比与发达国家超过40%相比是偏低的。原因一方面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住房与交通支出占比高达35%有关,挤占了“广义人力资本”的消费。

人力资本积累是实现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城市化在人力资本积累上应具有集聚效应,我们应发挥城市化在人力资本积累上的集聚效应。与此同时,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也是我国消费升级的过程,形成人力资本积累和消费升级的良性互动。

未来10到20年是我国突破原有增长模式锁定困境、向提高效率和技术创新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人力资本积累引领经济向技术创新转型,实现人力资本提升的消费和知识外溢能力的城市化。其根本在于分析新要素的出现,如教育、信息、创意、法律制度、企业家精神等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消费端则是大量知识产品的消费提升人力资本,这些新要素才能导致我国技术创新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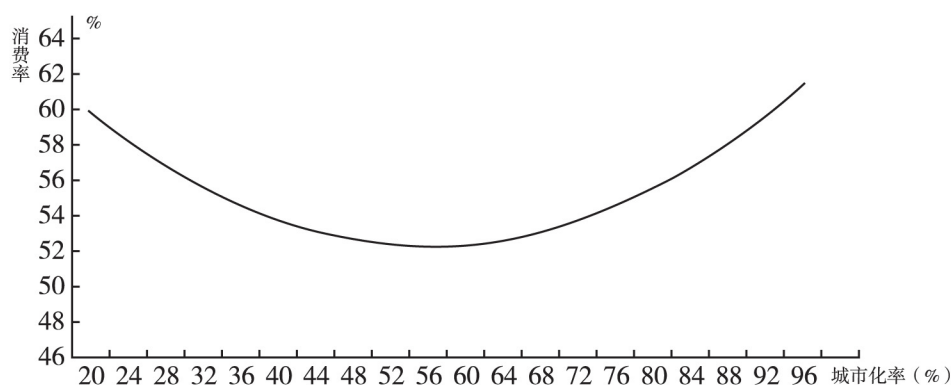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消费率与城市化率之间的关系

注：中国消费率与城市化率之间的关系是基于中国省（市）城市化率与消费率关系（1994—2015年）计算的城市化率与消费率的曲线，城市化率的转折点为56.19%，数据来源为陈昌兵（2016）。

过去30多年里，我国突破了“贫困化陷阱”，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扩张。但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供给效率低下等现实问题。与以往依靠物质资本积累和廉价劳动力的工业化模式不同，现阶段城市化可持续增长，不仅需要考虑生产供给面的效率，而且需要考虑消费模式的升级及其与生活模式的协同，广义人力资本和知识部门的发展应成为城市化可持续增长的新增长动力。知识技术部门自身不仅具有内生性，而且以其外溢性促进传统产业部门的发展，以此打通消费和生产一体化，有利于结构转型和经济升级。知识部门的生产与消费过程，也是人力资本提升和创新内生化的过程。在当前物质资本的增长驱动力减弱、同时城市居民收入提高及需求升级的条件下，加快政府及科、教、文、卫、体等公共部门和事业单位改革，大力释放知识技术部门的产出能力与消费潜力，转向“广义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消费主导的创新增长，是实现我国城市化可持续增长突破的关键。

目前我国正处于亟须提高创新能力、转变增长方式、促进城市化的可持续增长这一关键时期，人力资本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城市化的集聚如何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对保持我国城市化可持续增长有着显著意义。

正如Duranton & Puga(2004)在分析城市化的集聚微观基础时，提出城市化的分享、匹配和学习等机制提高集聚效应，这些机制尤其适合城市化的人力资本集聚效应。城市居民较为容易共享公共教育资源，但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后很难平等享受城市的公共教育；我国城市化中存在着公共卫生保健等方面的不平等；我国人力资本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分割，劳动力之间缺少交流等，这些因素将影响我国人力资本积累的城市化集聚效应机制。

城市化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集聚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一是公共教育、培训等方面的社会服务；二是医疗卫生保健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公共福利；三是由于城市居民具有接近优势，有利于人际交流从而提高技能性的人力资本。因此，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我们应发挥城市化这三个层次的人力资本积累集聚效应。

从世界追赶经济成功经验来看，增长阶段呈现出两个并行的路径，即生产模式的两步跨越和消费模式的两步跨越，每一步跨越都是模式特征的重新塑造和效率增进方式的再调整。消费模式的两步跨越，第一步跨越是在消费从属于通用技术生产模式的情况下，通过生产扩张满足基本物质品和服务需求；第二步跨越是通过广义人力资本积累，带动消费主导增长路径的生成，满足高质量物质品和高层次服务需求。第二步跨越实质上就是人力资本积累与消费升级的良性互动。

新时代我国创新发展在于生产方式与消费模式的创新。因为两者都强调知识过程的重要性，其一体化趋势日渐明朗。新部门的产生直接来自消费结构中高端项目活力的激发，反映在广义人力资本中的消费项目中对价值创造直接发生作用并促进独立的知识技术部门的形成。独立的知识技术

部门以其外溢性,提升通用技术水平、过滤掉低层次产业结构,促进整体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内生过程由此建立。这种知识技术过程,直接与新卡尔多事实相对应。新要素,包括知识、教育、信息、创意、制度、范围等,成为报酬递增的有力支撑。

满足新的消费需求,就是知识生产与知识消费一体化的过程,消费中的广义人力资本是破除消费投资障碍的核心,消费结构升级与人力资本积累之间是一致的。与高级化的消费结构相匹配的知识部门的存在,其自身人力资本创新创造具有高价值的生产特征,因此,它的出现是打破传统资本驱动生产方式的重要表征,这是人力资本积累的结果。其次,消费结构升级对物质产品质量的升级也提出了要求,要求生产模式升级,从而推动了人力资本的积累。直观来看,在理想的演替条件下,消费模式存在“劳动密集产品消费—耐用消费品消费—知识技术产品消费”的消费升级,生产模式应当与这种要求相一致,这就包含了人力资本积累与消费升级良性互动。

消费和服务业增长的关键不在于规模、比重,而在于经济结构升级,尤其是知识过程作用的发挥,也就是人力资本积累和生产中的运用及创新价值的实现。向发达城市化的增长转换时期,可能有两类导向性路径:一是囿于工业化规模扩张的惯性,服务业的发展以低技能的劳动力再生产为主;二是以知识过程为支撑的服务业的增长。经济结构服务化过程中,服务业规模扩张和比重增加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是推动这种状况的动力应该是服务业的结构升级以及消费结构升级与服务业增长的联动。基本品需求满足后,尤其是理论和现实中的富裕社会到来时,消费者选择日益与多样性、新奇性的心理需求联系起来,特别是服务业——当代知识信息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消费时尚的易变性和快速传播,消费者新奇的、主动的、内在的追求,推动消费和服务业结构升级。知识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赋予消费效率含义,并体现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要素化趋势中。

随着时间知识流的动态增长累积以及知识存量的更新,跨期的人力资本要素的培育,需要消费结构升级的支撑,消费结构中科教文卫部门的增长,从知识流的动态增长角度,已经突破了传统静态成本的范畴而具有动态效率。消费结构升级、人力资本升级、服务业结构升级在促进知识生产配置的同时,不断推动知识链条的延伸,并以此为纽带连接起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深化能力也得到提升。

知识过程的发生、循环和扩展,本质上是物质生产循环向以人为载体的知识循环体系的转换。因此,循环的起点逐步从生产转向消费,通过知识消费、知识网络的互动产生高质量的知识消费服务和创新溢价。知识过程如果不能有效地融合到传统的物质生产循环之中,那么,服务业升级转型和以人为主体的知识服务循环体系也将会失去作用。因此,为了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消费升级、服务业升级转型以及以人为主体的知识服务循环体系的人力资本积累应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机制:以人力资本积累需要的消费升级推动了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创新性产业升级,而创新性产业升级为人力资本积累给予报酬。

以人民为中心,化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运动为发展的动力,探索我国城市经济转型,经济增长模式升级,明确短板,改革不适应未来发展的体制,积极进取推进全民经济共享发展,则必将实现中国现代化强国目标。

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改革方向

我国现代化体系建设不仅表现在结构、效益、更表现在市场配置、动力机制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过程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创新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程度及治理能力的强弱,是一个

国家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市场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转型中三个最为核心的要素。改革开放 40 年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坚持市场化改革和积极对外开放,才能优化资源配置,激励创新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从市场治理的角度看,一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按照做大做强做优国有资本的思路,突破国有资产这一固定性概念,从国有资本预算入手进行国企改革,将极大地推动国有企业效率的提升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二是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魏加宁,2017)。

政府和社会治理都与财政体系改革密不可分。我国经济已经迈入到新发展阶段,宏观调控和政府治理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基于工业化的宏观调控和政府治理体系经过了近 25 年的实践,需要基于城市化和创新转型的思路进行重新设定和积极调整。城市化中的公共服务需求日益增加,而公共服务又具有属地性质,需要建立新的财税体制以适应深度城市化发展的需求。要对税收等各个环节进行综合改革:第一,基于增值税的间接税税收体制要积极向直接税转型;第二,税收体制要符合现代治理体系的建立,特别是在以城市经济为主体的体系下,强调税收与支出的匹配性,征税主体要从单一法人征收向着法人与自然人征收体制转型,征管环节从单一生产环节转向生产和消费环节转变,纳税与享受公共服务逐步连接起来;第三,重新厘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提升统筹等级,保障人这一活跃的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第四,政府从干预经济转向公共服务体系;第五,政府行为逐步纳入法制框架中,特别是税费、举债、支出等方面需要立法管理。治理的现代化和宏观调控的稳定化需要财政体制改革,同时需要金融体制转型,以更好服务实体。在金融双支柱政策与监管体系建立的基础上,构建法制健全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激励技术进步和资本要素配置优化。

我国市场化改革、财政、金融等宏观治理体系改革的当务之急就要稳定经济,提高国家防范系统性风险和激励经济转型新宏观治理体系,保障我国经济跨入高收入和高质量的发展阶段。从全球增长的一般规律看,只要我国经济增长保持高于发达国家的均值(不低于 4%),并保持汇率的稳定,我国与发达国家人均 GDP 就会不断收敛,成功跨进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宏观稳定不是消极的,而是要“稳中求进”,在宏观稳定的同时要激励国家向高质量、创新型转型。

我国宏观政策体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下具有不同的稳定作用和激励性特征。在传统计划经济中,国民经济计划替代了市场和企业行为,综合平衡稳定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成为经济发展的统领,政府直接干预经济,形成了大起大落的格局,政府干预是经济不稳定的来源。改革开放后,特别是 1994—1995 年基于工业化发展阶段,我们建立了财政、货币的宏观调控体系,稳定了经济,这一体系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我国宏观政策目标设定也随着经济增长阶段的变化而变化,经济增长从“又快又好”,而后转为“又好又快”,现阶段是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宏观政策目标是“稳中求进”,宏观激励体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市场化改革、微观国有企业和政府主体改革和宏观调控都是国家治理体系建立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的根本。只有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市场配置资源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宏观稳定机制才能完善。只有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提高,到 2035 年我国才能真正意义上基本实现现代化。

注:

- ①这些价值均以当期价格计算。
- ②此处的人均收入为依据图表集法测算的不变价美元衡量的人均 GNI 水平,主要是为了与世界银行给出的增长阶段划分标准的衡量指标一致,保持口径一致。
- ③按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15 年的最新收入分组(GNI per capita, Atlas method (current US\$))标准为: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 1045 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 1045~4125 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 4126~12735 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 12736 美元为高收入国家。
- ④2013 年巴西和阿根廷人均 GNI 分别为 12730 美元和 12770 美元,跨过高收入门槛,但在 2013 年之后经济出现下

滑,人均 GNI 连续下降,2016 年分别为 8840 美元和 11960 美元。因此,此处巴西和阿根廷停留中等偏高收入阶段的时间分别应为大于 17 年和大于 21 年。

⑤2016 年马来西亚人均 GNI 为 9850 美元。

参考文献:

- 陈昌兵,2016:《我国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城市化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
- 贺大兴 姚洋,2011:《社会平等、中性政府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研究》第 1 期。
- 林毅夫,2012:《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
- 刘世锦,2005:《增长模式转型压力与战略选择》,《经济学动态》第 9 期。
- 刘世锦,2017:《老经济与新动能》,中信出版社。
- 魏加宁,2017:《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发展出版社。
- 袁志刚,2006:《中国经济增长:制度、结构、福祉》,复旦大学出版社。
- 张军,2007:《分权与增长:中国的故事》,《经济学(季刊)》第 1 期。
- 张平 郭冠清,2016:《社会主义劳动力再生产、劳动价值创造与分享:理论、证据与政策》,《经济研究》第 8 期。
-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5:《突破经济增长减速的新要素供给理论、体制与政策选择》,《经济研究》第 11 期。
-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8:《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机制:证据、理论和政策》,《经济研究》第 10 期。
-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9:《城市化、产业效率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第 10 期。
- Cimoli, M. et al(2006), "A low-growth model: Informality as a structural constraint", *Revista Cepal* 88(1):367—371.
- Duranton, G. & D. Puga(2004), "Micro-foundation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n: J. V. Henderson & J. F. Thiss(eds),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Vol. 4, Amsterdam:North Holland.
- Gill, I. & H. Kharas(2007),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 World Bank.
- Grossman, G. M. & E. Helpman(1991), "Quality ladders and product cycl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6 (2):557—586.
- Eichengreen, B. et al(2011), "When fast 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No. 16919.
- Maddison, A. (2007),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OECD.
- Rada, C. (2007), "Stagnation or transformation of a dual economy through endogenous productivity growth",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1(5):711—740.
- Romer, P. M. (1990),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5):S71—S102.
- World Bank(2012), *China 2030*, World Bank.
- Song, Z. et al(2011), "Growing like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1):196—233.

(责任编辑:何伟)

(校对:孙志超)